

农村人口空心化与老龄化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

张骋扬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在当今城镇化的快速进程中, 农村人口空心化与老龄化相互交织, 成为制约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现实问题。传统将二者割裂开来的治理方式, 往往容易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认为农村空心化与老龄化本质上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在人口结构上的集中反映。文章深入剖析了二者相互加剧的内在逻辑, 指出当前在治理主体、资源配置、服务供给及物质基础等方面存在的痛点。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环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通过优化村庄布局改善人的生存环境, 通过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养老激发主体力量, 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夯实物质基础, 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现制度优越性, 最终实现农村人口结构优化与养老质量提升的协同共治。

关键词

农村空心化, 农村老龄化, 唯物史观, 协同治理, 互助养老, 乡村振兴

A Study on the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Rural Population Hollowing and Aging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engyang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16,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the deep intertwining of rural demographic hollowing-out and

aging has emerged as a major practical bottleneck constrain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raditional governance paradigms, which treat these two phenomena in isolation, often fall into the dilemma of addressing symptoms rather than root causes. Guided by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ural hollowing-out and aging are essentially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s of un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mismatch between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demographic structures.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ir mutual reinforcement, identifying current critical bottlenecks in governance subjects, resource allocation, service provision, and material foundations. Drawing on Marxist theories regard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humans and their environment,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governance approach. By optimizing village spatial layouts to improve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s, organizing mutual-aid elderly care to mobilize subjective agency, expand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y to consolidate the material base,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to manifes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ystem, this study ultimately aims to achieve a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rural demographic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elderly care quality enhancement.

Keywords

Rural Hollowing-Out, Rural Ag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ynergistic Governance, Mutual-Aid Elderly Car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1]”。因此,人口从来都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抽象数字,而是社会的真正主体;任何人口规律的背后,都深藏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逻辑底色。人口是社会的主体,人口规律受制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被卷入城市的现代大生产体系,这种要素的单向抽离,在物理空间和社会形态上直接催生了村庄“人去楼空、庭院荒芜、村落衰败”的空心化景象。与青壮年流失相伴而生的,是农村人口结构的剧烈沉降,留守群体被高度老龄化所裹挟。《2020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真实地刻画了这一断层:乡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攀升至 23.81% [2],远超城市同等水平,农村俨然成为老龄化浪潮冲击的最前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化,在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同时,加快了农村空心化发展,致使空心村问题日趋严峻[3]。然而,如果仅仅将空心化与老龄化视为两个平行的问题,便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误区。唯物辩证法强调用普遍联系的眼光看待问题,在农村的现实场域中,这两者绝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出一种彼此咬合、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性流出,如同抽干了乡村的“新鲜血液”,在数学统计上瞬间拉高了老龄人口占比;反过来,日益沉重且缺乏活力的老龄化底色,又使得乡村在产业承接、公共服务供给乃至文化生态上失去吸引力,形成一种反推力,进一步将原本可能留守的年轻人“逼出”村庄。

无论是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还是农村空心化,究其根本皆源于农村人口空心化[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必须剥离人口问题的表象,深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病

根。农村的空心化与老龄化，表面上看是人口绝对数量的锐减和年龄结构的倒挂，但其本质，却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生产力发展滞后、生产关系僵化难以适应时代变迁的必然产物。当城市的资本与工业不断扩张时，传统农业的小农生产方式未能及时完成现代化转型，导致乡村无法在本土为劳动力提供足以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因此，破解这一难题，绝不能仅仅在人口数字上做文章，而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与普遍联系的观点。我们要把应对老龄化危机与重塑乡村内生动力置于同一棋局中统筹考量，打破就养老谈养老、就建设谈建设的狭隘视角，在重构乡村产业体系、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通道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既契合中国乡土实际、又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协同治理之路。

2. 农村人口空心化与老龄化的内在逻辑

想要理解二者的关系，必须跳出单纯的人口数字统计，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去寻找根源。

2.1. 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导致的选择性流失

置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农村人口的流失绝非偶然，本质上属于统一市场背景下全国整体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5]。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传统农业效益相对低下，土地产出效益与务工收入的剪刀差越拉越大，传统农业在比较效益上的弱势暴露无遗，这种生产力层面的巨大落差，形成了强大的“拉力”和“推力”。在这种力量对比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强烈的选择性——那些身体好、具备一定文化素质且敢于试错的青壮年群体会优先选择离开。他们的离去，对城市而言是人口红利的注入，对村庄而言却是造血机能的抽离。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力资本的空心化，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多年持续外流是其直接原因，而其根本成因在于农村人力资本前期投资的不足和当期的严重流失[4]。这种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在乡土社会的物理空间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年龄断层，直接导致了农村常住人口中老年人比例的被动上升。剥开现象的表层不难发现，人口空心化从来就不只是一个静态概念，它本质上是一场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人口筛选过程。正是这种以青壮年绝对流失为核心特征的空心化，在短时间内强行压缩了农村人口结构正常的年龄梯度，成为了将农村老龄化推向险境最直接、最暴烈的推手。空心化是老龄化加速的直接推手。

2.2. 生产关系变革滞后引发的恶性循环

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外流，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乡村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与代际反哺型养老保障模式。伴随农业劳动主体的老龄化，我国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土地经营呈现显著的粗放化趋势，一些农村地区出现边际产出递减与土地撂荒问题[6]，致使乡村产业基础弱化，内生“造血”动能严重衰退。经济基础的薄弱直接制约了乡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与非农就业岗位的创造，导致城乡公共服务落差固化。这种效应不仅造成了青年劳动力返乡的受阻，更使因家庭照护需求而被动回流的中年群体陷入“守着老人没钱赚”困境。

由此，人口老龄化与乡村空心化之间形成了互为因果的负向强化机制。老龄化的加剧持续削弱乡村的经济承载力与要素集聚能力，进而将空心化状态“锁定”在缺乏产业支撑与人力资本补充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导致乡村发展陷入长期的停滞与内卷。

2.3. 人与生存环境的双向剥离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7]”。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环境处于双向塑造的辩证统一之中。然而在乡村空心化的进程中，这种统一被粗暴地割裂了。青壮年的离去，抽走的不仅仅是人口数量，更

是乡村赖以运转的社会生机。随着人的流失，乡村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双重萎缩。在物理空间上，缺乏人气滋养的房屋加速破败，道路及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村落风貌在自然侵蚀下走向衰败；在社会空间上，“空心化”瓦解了传统的熟人社会网络，走家串户的互动锐减，邻里间的互助关系趋于淡漠，原本充满烟火气的社会交往网络迅速空心化。

被迫留守在这样逐渐失去活力的环境中的老年人，承受着空间衰败的直接后果。物理空间的破败导致他们出行、购物、就医等日常起居困难重重；而社会空间的萎缩，则切断了他们获取情感支持的社会纽带，使其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比物质匮乏更严峻的是精神层面的空虚与孤独。这种人与环境的双向剥离，是二者交织叠加后深刻的社会危机。

3. 双重挤压下的现实困境：基于基层视角的审视

在空心化与老龄化的双重挤压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突出矛盾上。

3.1. 治理主体弱化与家庭功能外溢

传统乡村治理依赖村庄里的“能人”和青壮年，但现在村干部队伍普遍年龄偏大，精力有限。当前村级组织队伍普遍呈现老龄化特征，受限于精力与认知结构，其应对复杂公共事务的能力受限，乡村基层的动员与服务效能显著弱化。与治理主体老化相交织的，是家庭养老功能的急剧萎缩。在传统乡土语境中，子女代际支持在养老方式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8]，“养儿防老”的实质是依托代际间的空间邻近与日常照料来实现的。但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子代长期脱离村庄，家庭结构走向实质性的分散。尽管外出务工的子女仍承担一定的经济反哺义务，但生活起居上的实体照护却被迫中断。受制于工作压力与返乡成本，子女往往仅能在节假日短暂探视，使乡村老人长期处于事实上的“空巢”状态。

当家庭这一最底线的养老单元被打破，而普惠性、社会化的乡村养老体系又尚未有效建立时，农村养老便暴露出明显的保障真空。在这种“旧体系解体、新体系缺位”的过渡期，留守老人的脆弱性被极度放大。一旦遭遇突发疾病或意外跌倒等紧急状况，由于缺乏即时响应的邻里互助网络与专业救助机制，老人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生命安全与生存尊严面临直接威胁。

3.2. 居住分散与资源集中的冲突

农村的自然村落往往是历史上自发形成的，分布非常分散。在快速城镇化与旅游开发进程中，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作为社会与空间系统长期互动的产物，正遭遇严重破坏，呈现多维异质化问题^[9]。随着空心化加剧，很多自然村只剩下几个甚至十几个老人。如果要给每个自然村都配齐卫生室、老年活动室等设施，成本极高，根本不现实；但如果只把设施建在乡镇或大村庄，偏远地方的老人又走不过去。这种“人散地广”与“资源需要集中使用”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农村养老服务质量的重大硬件瓶颈。

3.3. 服务供给脱离实际与市场资本逐利性

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农村养老时，习惯于照搬城市的模式，建养老院。但农村老人习惯了散居，大多不愿离开老宅；同时，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水平相对较低，根本住不起、也住不惯这些高档机构。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资本具有逐利性。由于农村老人消费能力弱、居住分散，提供服务的成本高、利润低，纯粹的市场资本不愿意进入农村养老领域。这就导致很多地方的养老服务成了政府的“独角戏”，不仅财力难以支撑，而且提供的服务往往“供非所需”。

4. 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系统重构

面对上述困境，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和发展观，实现从“碎片化管理”向“协同治理”的

转变。

4.1. 坚持普遍联系：从“分治”走向“共治”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不是两道独立的数学题，而是一道综合的社会题。把养老问题纳入到乡村振兴的宏大蓝图中去统筹考虑，在解决空心化带来的土地闲置、布局不合理问题时，把老年人的需求放在首位；在发展养老事业时，通过吸引产业和人口回流来反哺空心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基层干部年轻化既需要区域差异化的吸纳机制，也需要建立老中青梯次性的培养机制，才能有效实现乡村人才振兴[10]。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2. 坚持群众路线：激发内生动力

在养老治理中，不能总是把老年人当成被动的、需要救济的“弱势群体”，而要看到他们身上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大量低龄、健康的农村老人，他们不仅有照料的需求，也有参与劳动、发挥余热、获得社会认同的需求。协同治理的核心，就是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变“政府干、群众看”为“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4.3. 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超越单纯生存保障的更高追求

农村老人同样有享受美好生活、获取精神满足的权利。协同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让老人吃上饭、有地方住”的最低生存保障层面，还要关注他们的医疗健康、文化娱乐和情感需求，让他们在晚年依然能体会到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5. 农村人口空心化与老龄化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协同治理应当从以下五个层面稳步推进。

5.1. 优化村庄布局，改善人的生存环境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环境辩证统一的原理，为破解乡村空心化引致的空间衰败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引。面对闲置与荒废的乡村空间，治理逻辑应摒弃脱离实际的强制性“大拆大建”，转向遵循人口流动与村庄演化规律的渐进式空间重构。在农村“空心化”背景下，乡建空间中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肩负着“适老”与“携幼”的服务使命，成为提升农居水平、储备乡村人力资源、助力乡村振兴重要的治理单元[11]。这不仅直接关乎着老年群体“留守式”生存的现实福祉，更间接地推动着农业经济的稳健发展。

对于那些地处偏远、生存条件恶劣、只剩下极少老年人的“空心村”，应当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稳妥地进行易地搬迁，将他们集中安置到乡镇中心或大村庄，直接改善他们的居住和就医环境。对于大多数村庄，重点应放在“微改造”上。比如，把闲置的校舍、厂房或者清理出来的闲置宅基地，改造成村里的老年食堂、日间照料中心等；对老人居住的老旧房屋进行防滑、无障碍等适老化改造，让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安全养老。同时，把腾退出来的土地指标和资源转化为村集体的资产，为养老事业筹集资金。

5.2. 办好群众期盼的实事，推进医养结合

在农村养老的现实语境中，健康风险的冲击力往往超越了绝对贫困，成为威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痛点。“因病致贫”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构成了农村家庭沉重的脆弱性负担。基于此，乡村养老服务的供给逻辑须发生转向，实现与基层医疗体系的深度联合。

破局的首要前提是筑牢县、乡、村三级医疗体制，坚决防止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随人口空心化而

同步衰退。在服务供给层面，乡村医生是开展双向转诊中上转的首要关口，对于落地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2]。应建立纵向联动机制，通过推行县乡两级医生定期下乡巡诊，同时将村医纳入基层养老服务网络，从而实现“小病不出村、慢病有托底”的常态化健康管理。

在空间布局上，需鼓励有条件的村庄打破部门壁垒，推动村卫生站与日间照料中心的相邻或功能整合，实现医养资源的无缝衔接与集约利用。

5.3.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夯实养老的物质基础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户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公共资源提供和个人能力提升实现农户经济韧性的提升[13]。必须把发展产业作为协同治理的压舱石，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户经济韧性的赋能作用。一方面，要利用好空心化腾退出来的土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合作社等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特色种植养殖，让村集体有稳定的收入。村集体有了钱，就可以给村里的老人发补贴、改善养老设施、为互助养老的护理员发工资。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发展“银发经济”。很多城里老人向往农村的好山好水，农村可以盘活闲置农房，发展乡村康养、旅居养老，把城市的消费力引到农村来。这不仅能给本村老人带来收益，还能创造保洁、餐饮、护理等就业岗位，吸引部分年轻人和中年人返乡就业，从根源上缓解空心化。

5.4. 发挥制度优势，强化政府统筹与兜底作用

协同治理并不是推卸政府责任，而是要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明确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的边界。政府的主责在于“保基本、兜底线”。对于农村的特困人员、低保中的失能老人，政府必须全额兜底。此外，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比如鼓励城市的专业护理人员到农村服务，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上给予特殊照顾等。

5.5. 依靠群众组织起来，大力发展互助养老

在政府财力有限、市场资本不愿进来的情况下，最现实、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自己，重建乡村的互助网络。可以探索“低龄存时间、高龄换服务”的互助模式，进一步将农村老年人细分为活力老人(助他)、自立老人(自助)和受助老人(他助)，并基于“行为-结构”框架建构分层分类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以活力老人助他为动力，激发农村养老新活力；以自立老人自助为核心，提升农村老人自我发展能力；以受助老人服务为重点，打造农村多元照护体系[14]。农村有大量60多岁、身体还硬朗的低龄老人，可以组织他们去照顾80多岁、身体不好的高龄老人或者失能老人。他们付出的劳动时间被记录下来，再由下一批低龄老人来照顾自己，或者由村里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这种模式把“养老”变成了“互帮互助”，不仅解决了人手短缺问题，更重要的是让低龄老人在劳动中获得了社会认同感，体现了劳动的价值。

6. 结论

农村人口空心化与老龄化，是中国在特定历史阶段、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这绝非不可战胜的绝症，而是当前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城乡发展不够平衡的集中体现。

本文的研究表明，企图在不改变空心化格局的前提下单纯解决养老问题，或者在进行村庄建设时忽视老年群体的切身利益，都是形而上学的、脱离实际的。只有坚持系统观念，将二者纳入协同治理的框架，在空间布局上顺应人口流动规律，在经济基础上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在制度保障上强化统筹兜底，在社会关系上重新组织群众发扬互助精神，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地域广阔,东部沿海富裕地区的农村与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农村,其空心化和老龄化的表现形态与物质基础差异巨大。因此,协同治理绝不能搞“一刀切”。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和现代服务业态;而经济薄弱地区则必须在更长时期内依靠基层的力量,坚守互助养老和政府兜底的底线。但无论采取何种路径,其核心理念不能偏离——那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村老年人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每一个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共享现代化成果。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92.
- [2] 老龄健康司. 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EB/OL]. 2021-10-15.
<https://www.nhc.gov.cn/ljks/c100157/202110/b365898ae2a4406d91e1b1ecd10ca911.shtml>, 2026-04-12.
- [3] 刘彦随, 刘玉. 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10, 29(1): 35-42.
- [4] 郑万军, 王文彬.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农村人口空心化治理[J]. 农村经济, 2015(12): 100-104.
- [5] 陈纪平. 人口流失的城市化效应:基于东北经验[J]. 人口与社会, 2025(2): 54-64.
- [6] 张琦, 张艳荣. 以农业社会化服务破解土地撂荒难题[J]. 人民论坛, 2023(5): 87-92.
- [7]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2.
- [8] 雒敏, 张悦. 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5, 42(12): 1427-1432.
- [9] 窦银娣, 吴玉婷, 李伯华. “社会-空间”互构视角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演化机理与修复路径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6, 45(3): 633-646.
- [10] 孟庆渡. 农村社区治理中“积极青年”何以形成?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2(6): 30-38
- [11] 白淼, 赵成波.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公共设施配建问题研究[J]. 农业经济, 2025(7): 74-76.
- [12] 刘伟, 张远华, 苏香菊. 乡村医生双向转诊面临的法律风险及防范策略[J]. 医学与社会, 2026(4): 139-144.
- [13] 张宇飞, 罗明忠.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户经济韧性的影响[J]. 农村金融研究, 2026(4): 1-13.
- [14] 李静, 颜振亮. 结构化理论视域下中国式农村养老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 2025, 55(4): 129-140.